

买票难 观察行进中国的一个切面

又到一年春运时,又见沉重的买票难景象。据报道,4日起,春运购票高峰期正式拉开序幕,抢票战也愈发白热化。“一票难求”,照例是舆情反馈中的关键词。买票难,难到什么程度?央视直播的上海—成都K696次网络售票现场,即为缩影:仅开始抢票40秒,就只剩下300多张票,3分钟后全部售罄。抢票大战之惨烈,由此可见一斑。

也难怪,每逢春运,“买票难”便成国人“咏叹调”。票难抢,人难回,乡愁难寄……中国式春运,俨然成为一枚中国化的“情景硬币”,以正反两面展现那些“痛并快乐着”,而买票难,犹如卡在乡愁咽喉处的一根刺,也拉长了跋涉与团聚的距离。

与抢票难伴随而至的,是对春运乱象的吐槽:12306“逢节必瘫”,“黄牛”猖獗,运力短缺……当人们的回家路被春运阻隔,可以想见,春运压力必然聚合于铁路,它也

势必沦为舆论呛声的汇流之地。实质上,每到此时,此前的铁道部门给出的“解决买票难时限”,都会成公众吐槽的矛头所指:2007年说是“2010年,买票难将有改观”;2009年又说“2012年,基本解决买票难”;2011年又换了个说法:“解决买票难,可能要到‘十二五’末期”……在买票依旧难的语境下,它注定成公众调侃的对象。

而近来,被吐槽最多的,大概是12306——虽说铁道部已改制,可12306依旧“惹眼”,动辄得咎。就在近日,12306还很“配合”地频现故障:春运首日,数度瘫痪,购票、查询等功能无法使用;还出现手机号漏洞;为拦下“抢票神器”,它改版推出的彩色动态验证码,左闪右晃,重复叠动,让人直呼是“毕加索的抽象画”;黄牛可用假身份证囤票的“后门”,也被人揪出。

针对质疑,12306网站方面也在积极

回应,及时调整:如将动态验证码升级,改为增加了底纹或干扰线的新版静态验证码;“验证码”升级后,黄牛退票回档也将失效等等。事实上,自铁道系统改制以来,12306购票网站改进不小。2013年12月6日,它曾正式改版,新版购票网站提供动态刷新、自动提交订单、支付宝支付等“抢票”服务。

但这仍难改被吐槽的境遇,如果在购票渠道、网站建设和资源调配上,12306能有更流畅的操作和更科学的设置,能提供更优质的用户体验——比如资源整合,别只盯着退票费率调整;功能补全,能少些跟市场化浏览器的“斗气”,多向天猫等学学……网络购票,还会遇到网站瘫痪等问题?

诸如如此的吐槽,直指铁路公共服务的亟待改善,也是积蓄多时的“春运挫败感”的一种倾泻。某种程度上,它不啻为

观察行进中国的一个切面:集结了垄断之弊、城市化之艰、民生之痛等,也夹杂着理清权责、放权让利、回应民生关切等现实命题。

“春运时,乡愁是一张薄薄的车票”,这话曾一语风行。而今,一张车票,载动的岂止是乡愁,更是现实之殇的微观映射:通往家的路阻滞漫长,可太多人宁愿历尽颠簸,忍受“人在囧途”的困厄,也要回家,个中固然有民族心理仪式的壮阔感,却更充斥着不尽辛酸——包括回乡之难、空巢之痛,包括公共服务的滞后等。

行进中的中国,免不了春运式的困顿。摒弃“买票难”,也很难一蹴而就,但公众都希望,它能快些、再快些。而这,也该落脚于公共服务环境的改善,大到铁路系统的优化,小到12306的技术提升,以切实的便民之举,纾缓公众在春运时刻的局促困顿。 明文

“桥坚强”需要 职业道德为底座

2日上午,武汉长江大桥水域,一艘重达9000吨的重庆籍货轮,因舵机失灵方向失控,擦碰8号桥墩向下游漂流,船体触礁破裂进水,而大桥安然无恙。自1957年10月建成通车,56年来,武汉长江大桥桥墩遭船舶撞击近百次,但从未伤筋动骨,依然巍然耸立。(1月3日《楚天都市报》)

一座修建于1957年的大桥却历经近百次船舶撞击而安然无恙,被誉为“桥坚强”。赞誉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,社会上对武汉长江大桥的赞扬,反映出民众对高质量工程的期望。近年来,随着“楼倒倒”、“桥脆脆”之类耗资巨巨却质量不高的工程频频曝光,民众对豆腐渣工程深恶痛绝,正是有了这一正一反的强烈对比,人们才会对武汉长江大桥给予了颇多赞美之词。

科技必然要以人为本,人是科技的核心要素。社会在进步,时代在发展,按照正常的社会发展轨迹,建筑工艺、施工质量自然也会随之不断提高。现实也纷纷给予了验证,嫦娥探月了,蛟龙深潜了,青藏铁路攻克了世界性难题,中国高铁实现了历史性飞跃,这些伟大成果在向世界昭示着中国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。然而,随着“桥脆脆”之类的豆腐渣工程不断被曝光,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也随之出现。其实,论施工装备、比技术条件、看施工材料,仅仅就这些硬件条件来讲,50年前和现在根本无法同日而语,但是,我们的先辈却硬是建造出了巍峨耸立的“桥坚强”。为什么会这样?除了设计者与建造者的责任和良心有所区别之外,我们恐怕无法找到更好的回答:除了参与者的职业道德水平有所差异之外,我们或许

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。再高的科技,再好的施工设备和材料,都不能决定一项工程质量是否合格的关键性因素。因为这些硬件的东西最终必须要人去操作、去使用,所以说,参与工程建设和管理的人才才是工程质量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,他们的职业道德水平将最终决定工程的质量水平。职业道德是指人们在职业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,即一般社会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。职业道德既是本行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,又是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和义务。比如说,救死扶伤对于医护人员的意义;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于警察的意义;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对于教育工作者的意义。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职业道德,对于工程人员而言,建造高质量的工程是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。没有职业道德作基础,再高明的技术,再庞大的资金投入,最终修起来的也只能是一座没有底座的大桥,早晚要成“桥脆脆”。

赞叹历史形成的“桥坚强”,其实是对现实的期盼。期盼每一位设计者、建造者都能严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,用智慧、责任、良心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上筑起更多的“桥坚强”,让我们每一个行走在桥上的人心中多一份踏实,让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根基更加稳固。 宋华

“ 继云南景谷一中上个月因“最牛校规”被围观后,宁波市北仑中学因一纸处分布告成为热点。布告称,该校6名学生上周日放学后在篮球场打球违反校规,被点名批评并扣分。对此,北仑区教育局已表示已要求学校撤回处分。(1月4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“放学后不许打球” 教育怎能如此粗暴

周日下午,已是放学时间,学生们在球场打球居然是违反校规,那么首先要问:学校的篮球场难道就是摆设?不是给学生活动、锻炼用的,就是为了应付上级考核,做样子的?

学生不能在学校打球,不能擅自进入运动场地,空教室也不能进入,如此强化校内秩序,实际上就是管理者图个省心。现在的学校管理者确实是越来越省心了,基本就是只抓“分数”这一项硬指标,“学校”的概念越来越变味,几乎就成了一个制作分数与升学的工具。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学生管理和教育的简单化:学生一有错,不是处分就是开除。学生被发现早恋,开除;扔纸飞机,开除;吹泡泡,开除;甚至竟有“砸铁门开除”的荒唐校规。总之就是教育管理越简单越好,传统的“诲人不倦”、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教育精神,不知什么时候丢了;现代人文教育理念,或许压根不知道为何物。唯一的王道就是分数、升学率。

放学时间都不让学生在球场打打球,是无视学生的天性。根本问题在于,学校的价值取向已经不是学生取向,而是管理者取向;一切以管理者利益最大化为本。而种种“最牛校规”所以不嫌荒唐,正因为校规的核心,强调的是管理者的利益,只要学生对学校绝对服从,只要学校秩序“井然”,而使管理成本达到最低,才是满足了管理者的要求。如此一来,“教育”成分还能剩下多少?学校与学校管理者的教育功能越来越退化,为“管理”所取代的“教育”,也就越来越粗暴,越来越看不见多少人性化。

种种雷人校规被曝光后,往往马上得到纠正,但是,总是依靠媒体曝光,毕竟不是长久的事,作为教育部门,是不是该对雷人校规进行全面清理了? 马涤明

“ 去ATM机取钱,结果发现上一个人取完钱还留下了一张卡,一看数字,250元!谁都会心里嘀咕一下。1月3日,大学生程雨就遇到了这样的事,但他最终还是拾金不昧,将卡交给了银行,可是心情却因此郁闷了好久(见4日《青年时报》)。

从“复杂”到“简单”也是一种境界

不管程雨当时是不是看错了数字,也不管捡到的银行卡里是2.5万还是250万,从最初短暂的犹豫、纠结、郁闷,到很快作出决定物归原主,显然并不影响其拾金不昧的美德成色,从犹豫到果决,从“复杂”到“简单”,恰恰见证了一种真实的心灵境界。

250万无疑是个可观的数字,在钱不是万能的、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金钱社会,换上谁心都难免会“咯噔”一下,“当时的心跳比见到女神还快,整个脑袋都是空白”,“毕竟这钱都能在老家买两栋别墅了,心里特别复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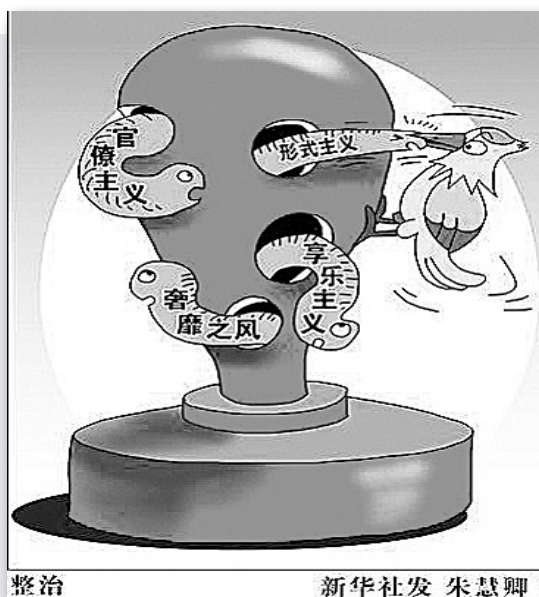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,这钱能不能拿的理性,最终还是战胜了钱重要不重要的感性,心智从一度的“复杂”渐渐回归到“简单”,进而又为“一分钟的迟疑”而懊恼,想必这是不少人面对“考验”都有过的心理轨迹,但凡经受住考验,就是对美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坚守。

前年某地一高速服务区清洁工深夜捡到一个钱包带回家,交警带着失主找上门后“完璧归赵”并谢绝了酬谢,结果却被以“归还不及时”为由辞退,此事一度引发社会热烈讨论。当事清洁工委屈地表示,自己清楚现场有监控,不可能占为己有,只是想等天亮后交给派出所处理。试想,即使其曾经闪过一丝“贪念”,如果有方面能够理解、善待从这种“复杂”到“简单”,未必不是对拾金不昧美德的呵护。

现实的社会,平凡的人,不可能每个人都表现出有多“高尚”和“伟大”,换言之,高尚的情怀、伟大的境界,往往都见之于平凡事、平凡人,过程可能很“复杂”,只要结果很“简单”,知可以为,亦知不能为,进而选择了坚守,何必非得用苛责的目光去打量、用严苛的方式去对待? 范子军

官员叹:公务员“难当” 网友:是难贪了!

刚刚过去的2013年,可谓公务员的“禁令之年”。从八项规定伊始,各部门至少出台了14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规定,涵盖了他们工作生活的各方面。“一条接一条,管得是越来越细,看来以后公务员是越来越不好当了,公务员职业的下行趋势估计是不可避免的了。”在公务员系统中待了8年的一位科级官员如此感叹。(1月1日《法治周末》) 据新华社



从交警离岗救人被记过看规则意识

日前在南京雨花区曹家路路口,78岁的老人突然晕倒。一女孩求助正在附近执勤的交通辅警叶林锋,叶立即跑过去扶起老人,叫同事开来警车把老人送至医院,老人得到及时救治。但是,叶林锋因离开岗位被记过处分。雨花区交警大队安宣办相关负责人表示,如果救人情况属实,不会对叶林锋批评处理,反而要提出表扬。

对于叶林锋不该被处分,可以说怎么决定都有道理。领导说要给他处分,这当然有根据,这就是,交警的岗位在路上,离开位置就是擅离职守,是违纪行为。但是,如果说叶林锋不该被处分,也有道理。因为叶林锋离开岗位,并不是擅离职守,而是去见义勇为,救人的生命应该比坚守岗位更加重要。所以,叶林锋不仅不应该被处分,而且应该被奖励。但是,我们就发现两个难以认同

的问题。第一,整个事情的决定权就在领导怎么看。领导可以按照制度进行处分,也可以离开制度,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奖励。这岂不是权力说了算?第二,今后,作为普通交警,再遇到类似情况,他们应该怎么做?所以,我们应该减少自由裁量,一切以制度为准。如果说,做了好事却违反制度,这正说明制度本身不科学。如果制度只是死规定,说一旦离开岗位就应该被处分,显然是不对的。制度应该表述为,擅离职守需要进行处分,但发生特殊紧急情况除外,离开岗位的合理性可以事后追认,这样的制度表达才是准确的。更重要的是,这样的制度,就不会出现由领导任意决定处罚还是奖励的问题。制度应该科学,而制度一旦制定,就必须坚决执行,领导也无权自由裁量。这里用得上一个故事:1764



净化口腔

近日,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,要求广播电视节目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,在推广普及普通话方面起到示范作用。其中,通知要求播音员主持人除节目特殊需要外,一律使用标准普通话。不得模仿地域特点突出的发音和表达方式,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俚语俗词等。业内人士表示,综艺节目主持人将首当其冲成为规范对象。 焦海洋/图

从法治和市场入手降低企业家犯罪率

法制日报《法人》杂志联合中国青年报联合制作的《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报告》近日发布,报告称,2013年大众网络媒体上公开报道的企业家犯罪信息总共357起。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357例案件中,国有企业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87件,占357例案件的24.4%,民营企业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270件,占357例案件总数的75.6%。

中国企业家犯罪率偏高,原因何在?和其他群体一样,个人因素肯定无法忽视,或因个体贪欲的膨胀,或因缺乏对法律的认识和敬畏,一步步陷入罪恶的渊薮。这一点从国有企业的主要罪名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。报告中说,在58例有明确罪名的国企企业家犯罪中,共涉及28个罪名,主要包括“受贿罪26例、贪污罪13例、挪用公款罪11例、诈骗罪7例、私分国有资产罪3例、重大责任事故罪3例、滥用职权罪3例”。由此可见受贿、贪污、挪用公款

是国有企业家犯罪的主要罪名,而这三种罪名都会让人联想到人性的恶。

但即使是国有企业家频频涉足的领域,仅仅归咎于个人因素也失于片面。任何心智正常者都会有占有财物的欲望,但现实是并非每一人都能够轻易遂愿。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,使其始终没有爆发的机会,这就是制度的作用。降低国有企业家的犯罪率,无疑还是要深化国企的改革,进一步厘清国企高管及其背后国人的“官商政商”界限,建立现代企业制度,使董事会、监事会切实发挥监督制约作用。相比于国有企业,民营企业家的犯罪现象似乎更为复杂。按照“研究报告”,2013年不仅民营企业涉案数要大得多,而且涉案领域也更为多元化,主要包括融资、财务管理、合同纠纷、安全生产、公司经营、产品质量、招投标等范围,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集资诈骗、涉税犯罪则是民企犯罪的重点罪名。从罪名分析,应

该不难看出一个结论:融资、对市场和利润的争夺,最容易诱发民营企业家的犯罪。

就在相关机构发布年度企业家研究报告的同时,媒体报道,“中小企业被高利贷绑架,有企业主被迫自杀”。依赖高利贷缓解资金困难,尽人皆知属于饮鸩止渴,但众多企业主饮鸩止渴不正是当下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自然结果?在2013年前后,围绕融资拿出了一些致使民营企业入狱的大案,面对这一现象,是该抨击企业家个人还是更应致力于金融改革?论及民营企业家的罪与罚,还不能不谈到这一群体与权力的关系。在依靠法治和市场解决问题成为习惯之前,游走于政经两道的两栖人物最容易制造财富神话。他们因依附于权力而崛起,活跃在法律的边缘地带,又往往因与权力的恩怨纠葛而坠落。从黄光裕到兰世立、李途纯,当年的商业英雄们,其大起大落的人生轨迹里,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

正因为见多了企业家们的罪与罚,2013年8月,万科董事长王石有感而发,谈到了企业家的自救问题,并提出了个人的答案,即“建立自救基金”,“注意自我更新”,“反省当前环境,该发言时不要沉默”。如果说“建立自救基金”、“注意自我更新”是企业家群体内部的行为,那么对环境的反省与改造显然并不仅仅是企业家们自己的责任。

企业家也是社会人,也应当遵守法律洁身自好,经由类似的自律,可以相信企业家的犯罪率会有所降低。但如果考虑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蓬勃的企业家精神,需要更多的商业英雄在为自己创富的同时使社会财富同步增值,那么怎样厘清权力与商业边界、建立法治市场经济,使才能和努力成为决定个人乃至企业前途的关键元素,则是全社会共同思考的紧迫命题。而毫无疑问,这实际也是降低企业家犯罪率的根本途径。 南文